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演变及其影响^{*}

王艺儒 肖文超

摘 要：委任统治初期，为了维护叙利亚国内政治稳定及牵制土耳其，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实施“有限支持”政策。不仅大量接收土耳其库尔德难民扶持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且大力推进库尔德农业定居化工程，但并不支持库尔德部落领导人提出的大范围地方自治诉求。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为了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法国当局针对库尔德局势又实施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对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暗中支持的反法组织莫罗德进行坚决镇压，另一方面鼓励叙利亚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甚至暗中扶持库尔德人与基督徒势力联合发起的贾兹拉自治运动。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政策的演变与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泛伊斯兰主义的话语宣传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型等存在密切联系。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委任统治 法国 叙利亚 库尔德问题 跨界民族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6CSS032）、2021年度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中东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项目编号：2021-CX-021）的阶段性成果。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叙利亚境内库尔德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对新时期中东地缘政治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与历史根源。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而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又与法国当局推行的库尔德政策密切相关。在法国当局政策的影响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得以进一步觉醒、发展并最终演化出库尔德问题。可以说，法国当局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命运，成为学界理解现代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历史源头。目前，国内外关于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缺少整体认知。除了库尔德问题学者乔迪·特耶尔·戈加斯在论著中涉及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一些事实之外，^①学界尚没有厘清法国当局政策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法国当局库尔德人政策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也缺少深入阐释。^②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梳理整个委任统治时期

① 法语文献中涉及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成果主要有 Jordi Tejel Gorgas, *Le mouvement Kurde de Turquie en exil: continuités et discontinuités du nationalisme kurde sous le mandat franç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1925–1946)*, Bern: Peter Lang, 2007; Jordi Tejel Gorgas, “Les Kurdes de Syrie, de la ‘dissimulation’ à la ‘visibilité’ ?”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Enligne]*, N° 115–116 (2006), pp.115–116; Jordi Tejel Gorgas, “Les constructions de l’identité kurde sous l’influence de la ‘connexion kurdo-française’ au Levant (1930–1946),” *Europea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Thematic Issue N°5 (2006), pp.1–25。需要指出的是，乔迪·特耶尔·戈加斯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对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给出深度阐释。

② 国外对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库尔德自治进程、库尔德政党政治以及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等展开，较少关注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相关研究成果参见 Yohanan Benhaim, Arthur Quesnay, “L’espace politique kurde dans le conflit syrien: intégration régionale et polarisation partisane,” *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N° 98 (2006), pp.75–87; Julie Gauthier, “Syrie: le facteur kurde,” *Outre-Terre*, Vol. 14, No. 1 (2006), pp.217–231; Thomas Schmidinger,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London: Transnational Press London, 2020;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Northern Syria: Governance, Diversity and Conflicts*, London: I. B. Tauris, 2019; Michael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 Gary C. Gambill, “The Kurdish Reawakening in Syria,”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Vol. 6, No. 4 (2004), pp.1–4; Spyridon Plakoudas, “The Syrian Kurds and 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The Outsider in the Syrian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8, No. 1 (2017), pp.99–116; Aylin Ünver Noi, “The Arab Spring, Its Effects on the Kurds, and the Approaches of Turkey, Iran, Syria, and Iraq on the Kurdish Issue,” *MERIA Journal*, Vol. 16, No. 2 (2012), pp.15–29。此外，国内学者对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研究同样侧重现实问题，仅有少数成果涉及委任统治时期的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相关成果参见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转下页）

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衍变的过程，深入探究其政策演化的原因与影响，揭示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实质，借以加深学界对现代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复杂性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当下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根源提供历史参考。

一、“一战”后初期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对委任统治的态度

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的建构，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后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确立委任统治的时期。1920年，协约国最高会议通过《圣雷莫决议》，决定对叙利亚实施委任统治。^①再加上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达成的有关规定，法国正式获得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1922年7月，《委任统治宪章》中明确规定了法国在委任统治期间的主要任务：（1）颁布一项支持地方自治的法令；（2）公共教育要利用本土语言；（3）确保领土安全并拥有对外事务权；（4）保证外国人的特权、豁免权和无差别待遇。^②

委任统治确立后，法国当局也开始接触到叙利亚北方地区的库尔德人。根据文献记载，委任统治期间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有25万，约占总人口295万的8.5%。^③其中，土耳其库尔德难民大约有2.2万人。^④在法国人看来，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这种“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地理布局、族群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对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上。第一，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区在地理上严重割裂，并不连续。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库尔德土地的集中连片相比，叙利亚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与

（接上页）2017年第6期；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2—226页；敏敏：《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04—213页。

① Stephen H.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99.

②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5。在“一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委任统治制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都遭到了舆论的负面报道。苏联和美国都不承认英法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协议》的有效性。

③ Ofra Bengio, *Kurdish Awakening: Nation Building in a Fragmented Homel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194.

④ Abbas Vali,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 2003, p.192.

土耳其边界附近三个狭长且不连续的飞地——贾兹拉（Jazira）、贾拉布鲁斯（Jarablus）以及库尔德山（Kurd Dagh）。^①库尔德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也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边境以北的若干定居点，如贾兹拉、马尔丁（Mardin）、努西宾（Nusaybin）和乌尔法（Urfa）等。这些地区彼此互不相连或与大马士革接壤。地理上的割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库尔德族群内部的互动和交流。

第二，库尔德人宗教与价值观的多元并存。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的差异，库尔德人聚居区生活着各种利益集团和族群派别。在北方库尔德地区，除了库尔德人以外，还生活着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雅兹迪教徒以及基督徒和犹太人等。^②根据1937年法国提交给国际联盟的报告显示，仅贾兹拉地区的人口中有82 000名库尔德村民、42 000名穆斯林阿拉伯牧民和32 000名基督教城镇居民。^③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与这些族群存在密切的互动与联系。^④据资料记载，自古代以来，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雅兹迪教徒以及犹太教徒等就已经在此互动、融合与共生。族裔身份和认同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多样化。

第三，库尔德人内部对是否融入阿拉伯社会存在严重分歧。在叙利亚城市中生活的库尔德人普遍主张融入阿拉伯社会。而在贾兹拉等农村地区，由于根深蒂固的部落认同和价值观，导致其并不认同城市库尔德人的社会价值观。相反，农业定居化进程的推进也致使贾兹拉等地区的各大库尔德部落进一步收紧了部落与土地的联系，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库尔德定居点的部落认同。库尔德学者塞巴斯蒂安·梅塞尔认为“城市中的库尔德知识分子与农村库尔德人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⑤

第四，库尔德人对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也存在严重对立。1920年法军占

① Jordi Tejel Gorgas, “Les Kurdes de Syrie, de la ‘dissimulation’ à la ‘visibilité’ ?” pp.115–116.

②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5.

③ David McDowe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New York: I. B. Tauris, 2004, p.470.

④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 pp.255–310. 这些族群和派系的凝聚力取决于对家庭、宗教社区、部落、城区和村庄的不同类型的忠诚。事实上，“原始依恋”（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定义库尔德社会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亲属关系、语言、宗教和社会实践继续吸引着个人和集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⑤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279.

领库尔德地区之后，库尔德人内部对法国占领的态度出现了分化。这种对立局面的形成主要受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生活在大马士革的城市库尔德人立即表示向法国效忠，尤其是优素福（Al-Yusuf）和沙姆丁（Shemdin）两大库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表现出好感。^①而生活在贾拉布鲁斯和贾兹拉农村的库尔德部落一部分则选择与法国当局合作，另外一部分则站队土耳其，在马拉什（Marash）、安泰普（Antep）和乌尔法附近阻击法军。

由此可见，委任统治时期库尔德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诸多因素都已表明，战后初期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是一个异质化的族群。^②对于这种现象，凯末尔·卡尔帕特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宗教遗产延伸到了现代中东国家，它们并没有成功将基于领土、种族或语言纽带的认同感和团结感完全融合在一起。^③当然，这样一种“碎片化”的族群生存和认同状态，也为委任统治确立后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背景。

二、1920—1930年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有限支持”政策

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为族群和宗教少数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欧洲列强的委任统治下，现代中东国家诞生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众多少数民族问题。^④对法国当局来说，其委任统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保护基督教社团的利益，同时也希望强化其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影响力。为此，法国始终把自己当作逊尼派穆斯林多数派与宗教族群少数派之间的调停者。为保持和强化其

①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86.

② Michael M. Gunter,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Kurd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367.

③ Kemal Karpat, "The Ottoman Ethnic and Confessional Leg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Milton Esman and Itamar Rabinovich (eds.), *Ethnicity, Plur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5-53.

④ Nadine Méouchy and Peter Sluglett, *The British and French mand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oston: Brill, 2004, p.580.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法国借鉴奥斯曼帝国的部落治理经验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①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不是寻求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保护非逊尼派宗教社团的基础上，尤其是强化对德鲁兹人、阿拉维教徒等少数派的支持。当然，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也暗合了《委任统治宪章》中提出的要求，即进一步保护某些宗教和少数民族自治权。除了德鲁兹人与阿拉维教徒之外，库尔德人作为叙利亚境内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群，早在委任统治初期就已经成为法国重点关注和争取的对象；法国还实施了“有限”支持政策。

（一）土叙边界争端中接收土耳其库尔德难民

1921年《安卡拉条约》签订后，法国与土耳其围绕贾兹拉的边界划定产生了冲突。由于贾兹拉处于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三国交界地带，极度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战后法国当局和土耳其激烈争夺的对象。一些法国官员认为贾兹拉临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必须优先保持其核心地位。法国试图控制贾兹拉不仅有推进农业定居化工程的经济考虑，而且有建立一个战略区，同时确保与摩苏尔的交通要道的意图。基于相同的目的，1925—1926年间土耳其也试图控制贾兹拉，并且干预力度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双边矛盾激化。

为确保叙利亚北方秩序，法国开始向库尔德地区大力渗透。法国当局意图通过打“库尔德牌”，在土叙边界谈判中对土耳其施压。一方面，法国当局不断向库尔德人和部落首领示好，以帮助法国尽快占领北部地区。支

① 法国在叙利亚的分而治之政策起源于委任统治时期（1920至1946年），当时法国通过国际联盟获得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权。这一政策旨在将叙利亚分割成各个宗派和地区，以实现法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据叙利亚的宗教和民族差异，将该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宗派区域。法国将基督教徒、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德鲁兹派等不同宗派的群体分隔开来，试图通过对宗派之间的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法国当局可能通过提拔和支持某些宗派的领导人，对宗派给予特殊的政治待遇，或者通过制定特定的法律和政策来影响宗派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干预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法国统治的宗派格局，使其能够有效地掌控叙利亚。然而，法国的这种宗派政策并没有成功地巩固他们的统治。相反，它加剧了叙利亚人民对法国统治的不满和抵抗。宗派之间的隔离和法国的干预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紧张和冲突，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统治地位。最终，在1946年，叙利亚获得了独立，并结束了法国的委任统治。

持法国当局的库尔德部落也希望借助法军的保护来进一步维护部落利益。另一方面,法国当局加大了接收土耳其库尔德难民的力度。为了增加接收数量,法国当局甚至鼓励参加1925年谢赫·赛义德暴动失败后的土耳其库尔德难民以及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被驱逐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到叙利亚定居并提供政治庇护。土耳其政府认为法国对库尔德难民的接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些库尔德难民基本都是1925年土耳其镇压谢赫·赛义德暴动后逃到叙利亚境内的,并且对土耳其政府怀有敌意。除了接收土耳其库尔德难民之外,法国当局还暗中支持土耳其库尔德难民在叙利亚境内组建霍伊布联盟(Khoybun League)并开展反对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①根据档案文献记载,法国当局为1925年霍伊布联盟的成立提供了大量资助。^②1928年,霍伊布联盟发起的土耳其阿拉特山库尔德共和国暴动,就被认为有法国当局的幕后支持。^③国际库尔德问题专家沃第尔·吉瓦德赫认为霍伊布联盟的建立为法国当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展开密切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④

法国打“库尔德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谈判的最终结果。1929年6月,法国当局与土耳其最终签署了一项边界协定,详细划分了努西宾(Nissibin)和贾兹拉·伊本·奥马尔(Jazira Ibn Omar)之间的边界线。作为就协定达成的交换,法国当局承诺将参与谢赫·赛义德叛乱的80个库尔德村庄划入土耳其境内,法国当局将其他的85个库尔德村庄安置到底格里斯河附近。1930年5月3日,一项涵盖土耳其与叙利亚双方、划定桑贾克以东整个边界的最终划界议定书得到确认并交存于国际联盟。^⑤土叙边界问题的暂时解决并不代表土法双边关系的稳定。相反,此后法国当局与土耳其依然在叙利亚北方库尔德地区打“库尔德牌”来削弱对方的利益、弱化对方的存在。^⑥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454.

② “AIR 23/413, Memorandum, Special Service Office at Sulaimani to Air Staff Intelligence, Air Headquarters, Baghdad, 31 March, 1928,” in A. L. P. Burdett, *Records of the Kurds: Territory, Revolt and Nationalism, 1831–1979*, Volume 7: 1927–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2015, p.100.

③ Julie Gauthier, “Syrie: le facteur kurde,” pp.217–231.

④ Wadie Jwaideh,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145–146.

⑤ “Syria-Turkey bord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E2%80%93Turkey_border#cite_note-IBS163-5.

⑥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urdish Studies*, Vol. 21, No. 1–2 (2007), p.98.

（二）推进农业定居化工程，为库尔德移民建造新家园

“一战”后法国虽然获得了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但并不受法国国内舆论支持。法国当局不得不发起一项以“文明使命”为幌子的经济发展工程以证实其委任统治的合法性。其中，推进库尔德地区游牧部落的定居化与叙利亚定居农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其“文明使命”的重要构成部分。法国当局推行农业定居化工程的关键环节，是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务农人口。但是，委任统治初期贾兹拉等地区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在内都无法满足大量的耕地诉求。面对人口匮乏的严重挑战，法国高级专员试图招募来自周边国家的移民和难民进入叙利亚境内，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等。法国当局选择接收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人口，不仅旨在通过增加这些少数族群来推动农业定居化工程，而且更希望获得来自土耳其难民的政治忠诚来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定居化工程并不是法国人的新发明。自17世纪末期开始，奥斯曼政府为了加强对游牧库尔德人的控制就已经施行过农业定居化工程。1930年法军完全占领贾兹拉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地区局势，遂延续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继续推进农业定居化工程。法国当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妥善安置土耳其库尔德难民。法国当局主要将土耳其库尔德难民安置在哈塞克、卡米什利以及阿穆达（Amuda）等城镇，同时给予他们足够耕种的土地。法国当局鼓励各库尔德部落定居和耕种土地。此举既可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又可以增加贾兹拉地区的农业产量。（2）鼓励城市化，兴建城镇和商贸中心。为了推进库尔德地区的经贸活动，法国当局还建立了卡米什利（Qamlishi）和哈塞克（Hasaka）两个城镇，并在两大城镇周边扩建了诸多库尔德村落。^①来自土耳其的大批库尔德名人、地主和武装暴动者在法国当局的庇护下很快融入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②

尽管接收库尔德难民曾受到土耳其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是在库尔德难民

① Julie Gauthier, "Syrie: le facteur kurde," pp.217-231.

②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p.87.

融入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后,法国农业定居化工程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不仅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且贾兹拉地区的农业发展也带动了一些新商业中心的成立,弥补了该地区传统商业市场的缺失。法国当局建立的哈塞克与卡米什利两个城镇也逐渐成为该地区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中心。除米里斯(Millis)和米兰斯(Mirans)两个部落保留了传统的季节性游牧活动之外,大多数库尔德人已经在贾兹拉地区实现了安置定居。^①

(三) 不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大范围地方自治诉求

在委任统治确立后,法国当局实施了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由于叙利亚库尔德人也希望像德鲁兹、马龙派基督徒那样实现地方自治,于是一些部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库尔德地方自治的政治诉求。早在1924年5月,库尔德山的部落领导人诺里·康提(Nouri Kandy)就向高级专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所有地区实行行政自治。^②巴拉奇联盟(Barazi Confederation)的部落领袖穆罕默德·萨因(Muhammad Shahin)和波赞(Bozan)也分别递交了寻求库尔德自治的请愿书。穆斯塔法·萨因(Mustafa Shahin)在第三份请愿书中向法国当局呼吁以居住在贾拉布鲁斯和努西宾(Nusaybin)之间的所有库尔德部落为中心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国家。这个国家既可以作为对抗土耳其的缓冲区,同时也可以进一步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野心。这三份请愿书都希望法国成为库尔德人自治的支持者,而不是仅仅希望获得对库尔德人有利的特定文化或政治权利。^③为了以实际行动获取法国当局的支持,在1925年叙利亚民众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大起义中,大量的部落库尔德人甚至主动加入了黎凡特特种部队,为法国当局稳定战后初期的叙利亚政局做出了贡献。

1928年8月,霍伊布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宪章》中有关地方自治的规定,再次向法国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库尔德地方自治的备忘录。备忘录主要内容

①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p.87.

②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209页。

③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p.99.

包括：（1）在学校引入库尔德语教学；（2）用库尔德人取代该地区所有公务员；（3）建立库尔德骑兵保卫边境；（4）安置库尔德难民从事农牧业生产。^①该备忘录也被认为是叙利亚库尔德民族意识的第一次真正表达。^②然而，面对库尔德人不断提出的自治诉求，法国当局并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承诺，主要原因在于不愿意激化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土耳其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免影响地区局势稳定。^③

法国当局虽然明面拒绝支持库尔德部落领导人提出的自治诉求，但是实际上默许了一些法国军官在贾兹拉地区实施的小规模地方自治计划。最早提出在贾兹拉建立自治的是法军中尉皮埃尔·泰里耶（Pierre Terrier）。1924—1927年，皮埃尔·泰里耶长驻贾兹拉，专门负责处理法国当局与库尔德事务问题。泰里耶充分认识到土耳其库尔德难民对贾兹拉发展以及在土叙边界争端中的潜在影响。为此，他不但大量接收库尔德难民，甚至与一些库尔德部落领袖建立了密切联系。赫维坎部落的哈乔（Hajo）阿迦甚至向他表示愿意随时服从他的命令。鉴于三个库尔德飞地都有自治的诉求，泰里耶认为创建一个包括所有三个地区的自治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库尔德领导人集中精力于贾兹拉地区，同时也可以满足库尔德山和贾拉布鲁斯库尔德人的一些特权要求。^④泰里耶在贾兹拉实施的一系列自治计划也被学界称为“泰里耶计划”。1927年，泰里耶离开贾兹拉进入高级专员内阁，这一职位为他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泰里耶计划”提供了便利。在泰里耶的影响下，贾兹拉、大马士革以及贝鲁特等先后成为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并深化了库尔德人与法国当局的合作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还是有一部分反法库尔德人选择与土耳其结盟，并在马拉什、安泰普和乌尔法地区继续抵抗法国军队。他们将土耳其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将法国视为占领者和压迫者。库尔德人与土耳其的联盟对法国政府在叙利亚北方地区构成了持续

①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28.

②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p.453-454.

③ Julie Gauthier, "Syrie: le facteur kurde," pp.217-231.

④ Jordi Tejel Gorgas, "The Terrier Pla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Policy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 Syria, 1926-1936," pp.100-101.

挑战。为了应对反法库尔德人的抵抗运动及其与土耳其的联盟，法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一方面，法国当局通过采用政治分化策略来分裂和削弱反法库尔德人的抵抗力量。他们与库尔德部落领袖建立联系，并联合一些亲法库尔德部落破坏库尔德—土耳其联盟；另一方面，法国当局诉诸军事行动，以镇压这些地区库尔德人的抵抗运动。他们部署了部队以平息武装反对派，并重新控制了库尔德人抵抗地区。此外，法国当局还限制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和自治权，同时将库尔德地区的行政和教育系统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综上所述，在委任统治初期，法国当局并没有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实施无限支持政策，相反根据地区局势进行综合估量后实施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有限支持政策。当然，这种有限的支持政策本质上还是为构建其委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确保殖民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库尔德学者朱莉·高蒂尔认为，“法国将库尔德人视为一个偶尔可以依靠的少数民族：在对抗土耳其时作为外部支持，在面对叙利亚民族主义时作为内部支持。然而，与其他社团不同，巴黎并未将他们置于其殖民政策的核心”。^①

三、适时调整：1930—1946年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政策的嬗变

1930年，法国军队完全控制了贾兹拉地区。同时，受地缘政治环境变动的影响，叙利亚境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堪。为了进一步稳定叙利亚北方局势，法国当局对库尔德人实施了新的“分而治之”政策。当然，这种政策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库尔德人对法国当局的态度。具体来说，对于亲法的库尔德组织与个人，法国当局予以坚定支持；而对于反法的库尔德势力，则予以坚决打压。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境内新库尔德人政策的生成，是委任统治中后期法国当局不断调适对其政治与经济压力的必然结果。

^① Julie Gauthier, “Syrie: le facteur kurde,” pp.217–231.

（一）扶持叙利亚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

1930年土耳其阿拉特山库尔德起义被政府军镇压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开始对此前发起的多轮反土耳其武装运动进行反思。库尔德精英们普遍认为，没有大国的支持，仅靠零散的反土耳其武装行动毫无意义。同时，叙利亚库尔德社会的碎片化也限制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挑战，以贾拉特·贝迪尔汗和卡姆兰·贝迪尔汗兄弟为代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向文化领域，力图通过恢复使用库尔德语和推广库尔德文学来唤醒库尔德人沉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库尔德社团的民族认同感。弃“剑”从“文”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新形态。^①

事实上，库尔德民族文化复兴工程也契合了法国当局的利益，并为此受到鼓励和支持。法国当局支持库尔德文化复兴的主要意图有两点：第一，由于土叙边界争端已经解决，法国当局不愿意再支持库尔德人的反土活动，以避免加剧土耳其与法国双边关系的紧张；第二，通过支持库尔德文化复兴活动达到牵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的。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叙利亚很快成为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的新中心。^②法国当局不仅为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提供良好政治环境，甚至直接参与和影响了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的进程。一方面，支持贝迪尔汗兄弟创办《哈瓦尔》（*Hawar*）作为推动库尔德文化复兴的重要平台。1932年，贾拉特·贝迪尔汗创办《哈瓦尔》并担任主编。《哈瓦尔》的办刊宗旨是宣传库尔德文化，塑造库尔德民族认同。该刊物旨在实现七个目标：（1）传播库尔德字母表；（2）分类和出版库尔德语语法；（3）对库尔德语不同方言进行比较研究；（4）出版库尔德经典和民间传说；（5）界定传统库尔德音乐的特点；（6）出版关于库尔德人传统和习俗的民族志研究成果；（7）发表关于库尔德斯坦历史和地理研究的成果。^③在实际办刊过程

① Michael M.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p.12.

② Ahmet Serdar Akturk, *Imagining Kurdish Identity in Mandatory Syria: Finding a Nation in Exil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kansas, 2013, p.72.

③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Iranian Studies*, Vol. 47, No. 5 (2014), p.849.

中,《哈瓦尔》开设各种主题专栏,刊登了大量库尔德散文、诗歌、戏剧、音乐以及库尔德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成果。^①在实际办刊过程中,《哈瓦尔》引入了拉丁字母的音译系统,此举被认为是库尔德语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哈瓦尔》以库曼吉方言为主,但是依然坚持发行法语版本。《哈瓦尔》的出版对于推进库尔德语言的标准化形成与规范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在贝迪尔汗兄弟创办《哈瓦尔》的过程中,法国当局给予了很大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是无条件的。法国当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刊内部运作和期刊资源的支配。法国当局按月给予杂志以资金出版补贴,但是要求杂志的立场要正确,同时建立了严格审查机制,规定其出版内容不涉及政治问题,只发表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③

另一方面,为了监督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法国当局也鼓励一些年轻的军官与库尔德文化精英们进行密切合作。皮埃尔·朗多(Pierre Rondot)和罗杰·莱斯科特(Roger Lescot)被认为是库尔德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他们与贝迪尔汗兄弟的密切合作为库尔德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20世纪30年代及随后几十年的库尔德民族认同表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皮埃尔·朗多对库尔德故事和谚语的调研,为《哈瓦尔》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素材,也将库尔德知识分子的诉求传递到西方世界。同时,为了彰显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他们与贝迪尔汗一起通过谚语向西方民众展示:库尔德人与欧洲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一样拥有历史悠久且丰富的民间文化。

1933年,法国当局甚至允许库尔德人进入哈马(Hama)军事学校学习,同时每年都为来自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提供奖学金。此外,当局还支持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高等教育研究所开设库尔德语课程,甚至为法国官员开设

① 《哈瓦尔》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强调库尔德文化遗产、语言和教育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整个库尔德民族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影响了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而且开启了叙利亚库尔德社团内部不同阶层的对话交流,实现了库尔德名人与精英知识分子、城市库尔德人与部落精英之间的积极互动。以贝迪尔汗兄弟为代表的杂志创办者认为,认同、共享库尔德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结束部落领导人与城市知识精英之间围绕库尔德传统的论争,而且为有效动员库尔德人开辟了新途径。参见肖文超、王雨馨:《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4期。

② Bilal Çelik, "Translation in the Kurdish Magazine Hawar: The Making and Legitimization of a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Vol. 14, No. 2 (2019), p.284.

③ Abbas Vali,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209.

库尔德语课程。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对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法国当局旨在通过支持库尔德文化复兴活动来减少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激进活动,而不是支持建立一个所谓自治或者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①

法国当局对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的支持,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是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法国高级专员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质疑表现出极端敏感。由于叙利亚公共教育语言方案中规定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法语以及土耳其语(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地区),并不包括其他族群语言,所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支持库尔德语教育,认为此举不利于统一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的推进。^②为此,法国当局不得不对库尔德语教学进行限制。这也迫使库尔德精英们只能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来填补被压制的教育空间。例如,在夜校、宗教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以及提倡个人自学等方式。^③

(二) 镇压库尔德山的莫罗德反法暴动

虽然法国当局默许泰里耶在贾兹拉实施小规模区域自治计划,但是并不代表法国人会无视一些库尔德地区的反法运动。在库尔德山,由于没有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霍伊布联盟的影响力一直相对薄弱。^④尽管该地区也积极呼吁地方自治,但都遭到了法国当局的严厉拒绝。“一战”后的库尔德山是一个由小地主和被剥削的底层佃户和佃农组成的社会。自1929年易卜拉欣·哈利勒(Ibrahim Khalil)来到库尔德山布道后,纳克什班迪(Naqshbandi)教团开始融入当地社会。易卜拉欣·哈利勒通过布道聚集了大量追随者,并建立了一个号称“莫罗德”(Murud)的组织,希望通过运动来宣传其宗教和社会理念。莫罗德组织很快获取了当地农民的大力支持。就连土耳其政府和阿拉伯民族集团都看到了引发动乱的可能性,甚至为他们送去

①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p.281.

②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853.

③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26.

④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14, p.61.

了武器和弹药，希望其发动一场反法暴动。莫罗德运动最初是一场宗教和社会运动，旨在传播纳克什班迪的宗教传统。但从1936年起，莫罗德运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发起了反对法国占领叙利亚的武装斗争。^①这场武装斗争性质转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该组织获得了叙利亚阿拉伯民族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源于法国当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保护了阿迦瓦特（Aghawat）宗教群体的特权。1939年，莫罗德的武装运动扩散到法国的军事驻地阿扎兹（Azaz）附近。^②法国驻军进行了反击，并先后打击了莫罗德在北部边境地区的据点，摧毁了附近的村庄。易卜拉欣·哈利勒及莫罗德组织成员被迫越过边境逃往土耳其。从1940年开始，莫罗德组织在库尔德山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渐衰落。^③

这场运动在当地被称为“库尔德革命”，事实上也隐含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易卜拉欣·哈利勒曾在莫罗德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库尔德山处于莫罗德组织的管理之下，那么该组织将要求获得类似于哈塔伊省的自治权。法国当局回应称只要库尔德山的所有领导人都同意就会予以重点考虑。^④但是，由于阿迦瓦特（Aghawat）与莫罗德组织之间没有达成协议，最终导致该地区没有获得自治权。当然，这种自治的政治诉求实际上受到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

（三）暗中支持库尔德—基督徒联合自治运动

1936年《法叙条约》是叙利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曾一度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依据条约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民族政府，用叙利亚官员取代了贾兹拉的法国官员。虽然该条约满足了阿拉伯民族集团建立叙利亚新政府的政治诉求，但是1936年《法叙条约》没有包括任何有关贾兹拉地位的内容，事实上也宣告了法国—库尔德人关系的终结。这引起库尔德人以及基督教势力等少数派的严重不满，并导致整个

①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p.61.

②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p.64.

③ 谢赫·易卜拉欣·哈利勒和其他支持者试图重振该组织，他们在1940年发动了多次越境袭击。土耳其当局将其转移到土耳其内陆地区并向他提供农田。库尔德山的莫罗德一直忠于他，直到1952年他去世。

④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p.64.

库尔德地区部落分化成支持阿拉伯民族政府的联盟派以及主张在贾兹拉建立独立政府的自治派。^①

随着阿拉伯民族集团在贾兹拉地区行政体系的确立，法国在该地区对受保护人的需求被消除，威胁到以农村为基础的库尔德部落领导人和城市基督教名人的地位和利益。1936—1939年间，作为对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和叙利亚新政府成立的政治回应，由哈乔阿迦等部落领导人联合发起的库尔德—基督教联合自治运动迅速席卷整个叙利亚库尔德地区。^②联合自治运动提出了如下要求：获得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或亚历山大勒塔的桑贾克同等的自治地位，任命一位对国际联盟负责的法国总督；^③在学校推广库尔德语，聘用库尔德官员等。为进一步获取外部支持，联合自治主义者签署请愿书并将其送交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1937年8月，库尔德—基督徒联合自治运动的成员袭击了阿拉伯民族集团政府办公室，并建立了新政府。^④阿拉伯民族集团也在阿穆德（Amude）袭击基督徒作为报复，并导致24人死亡。1938年9月，哈乔在贾兹拉主持召开了一次大会，呼吁法国允准自治。^⑤1939年，联合自治运动与阿拉伯民族集团冲突导致的混乱局势，迫使法国当局直接出动军队进行了强力干预，法国当局重新建立对贾兹拉地区的直接控制。^⑥随后，新任法国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普奥（Gabriel Puaux）宣布解散议会，并为贾巴尔·德鲁兹（Jabal Druze）、拉塔基亚（Latakia）和贾兹拉创建了自治政府，一直持续到1943年。^⑦

① Jordi Tejel Gorgas, “Les territoires de marge de la Syrie mandataire: le mouvement autonomiste de la Haute Jazira, paradoxes et ambiguïtés d’une intégration ‘nationale’ inachevée (1936–1939),”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Vol. 126 (2009), pp.205–222.

② 除了哈乔阿迦之外，卡米什利市长米歇尔·多姆（Michel Dome）、叙利亚一天主教贾兹拉地区的大主教汉娜·赫贝（Hanna Hebe）共同参与领导。哈吉作为贾兹拉的库尔德部落代表与基督教名人维持联盟。1938年，他还曾担任贾兹拉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起草临时地区法规。参见Jordi Tejel Gorgas, “Les territoires de marge de la Syrie mandataire: le mouvement autonomiste de la Haute Jazira, paradoxes et ambiguïtés d’une intégration ‘nationale’ inachevée (1936–1939),” pp.205–222.

③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30.

④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pp.88–89.

⑤ Jordi Tejel Gorgas, “Les Kurdes de Syrie, de la ‘dissimulation’ à la ‘visibilité’ ?” pp.115–116.

⑥ Jordi Tejel Gorgas, “Repenser les nationalismes ‘minoritaires’ : le nationalisme kurde en Irak et en Syrie durant la période des Mandats, entre tradition et modernité,” *A Contrario*, Vol. 11, No. 1 (2009), pp.151–173.

⑦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36.

在贾兹拉和叙利亚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阿拉伯民族集团的失败,最终不仅《法叙条约》没有得到法国新政府的批准,而且导致了叙利亚宪法被废除,议会也被解散的结果。事实上,这场联合自治运动不仅是对1936年《法叙条约》的直接回应,也是泰里耶计划影响的直接结果,并得到了法国当局的暗中支持。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法国当局不仅施压阿拉伯民族集团,要求他们承认贾兹拉库尔德人的选举结果,而且于1939年掌控贾兹拉后再次允许建立一些库尔德社会、文化组织和俱乐部等。法国当局支持联合自治运动的最终意图在于破坏《法叙条约》和叙利亚新政府的顺利运行,以达到再次全盘控制叙利亚的目的。

“二战”爆发后,虽然法国败降对其在黎凡特地区的委任统治产生了影响,但自由法国采取了继续支持库尔德文化自治的政策。1941年,中断了近六年的《哈瓦尔》复刊。1942年,贾拉特·贝迪尔汗和罗杰·莱斯科又为《哈瓦尔》建立了一份名为《光明》(*Ronahî*)的副刊。皮埃尔·朗多和罗杰·莱斯科特再一次超越了他们的官方使命框架,为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背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援助。^①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期间法国当局对文化活动的支持,并不代表其对库尔德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保障。伴随着1946年法军在黎凡特地区的最终撤离,基督教脱离联合自治运动,库尔德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并开始尝试融入叙利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进程。然而,事实上库尔德人的自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并影响至今。

四、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对库尔德人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影响

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当局从初期的有限支持到根据地缘政治局势实施新的“分而治之”政策,其对库尔德人的政策经历了根本性调整。从深层次来看,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当局对库尔德人政策的根本性演变是由一系列复

^①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 852.

杂的综合性因素所导致的。

第一，战后中东秩序重构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导致了中东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中东地缘政治秩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和重构时期。法国借助国际联盟的名义获得了在黎凡特的委任统治权，导致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为了制衡阿拉伯民族主义，稳定其在叙利亚的统治秩序，法国人采用西方列强常用的民族分治政策，强化对族群和宗教少数派利益的保护。法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事实上也是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委任统治初期，法国当局为了安抚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对库尔德人提出的大范围自治诉求并不支持。而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再次高涨，严重威胁到法国的殖民利益。为了破坏叙利亚阿拉伯民族集团新政府，法国当局不但支持霍伊布联盟发起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而且暗中鼓动库尔德人与基督徒势力联合发起自治运动。可以说，在委任统治时期的不同阶段中，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出于制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需要，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法国当局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变化。

第二，土耳其及其泛伊斯兰主义话语的潜在影响。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虽然诞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但是各国之间的边界依然是地区矛盾和争端的爆发点。在委任统治期间，土耳其与法国当局围绕贾兹拉边界问题有着严重的矛盾，并展开了多轮谈判。为了获得边界谈判的主控权，法国当局不仅大量接收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而且支持霍伊布联盟的反土耳其活动。尽管此举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反对，但是也为法国当局获得贾兹拉的最终归属权提供了重要保证。1929年土叙边界争端解决后，为了避免土耳其的不满，法国不再支持库尔德人反土耳其的政治活动，转而扶持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此外，土耳其泛伊斯兰主义也加剧了库尔德部落的内部分化。一些亲土耳其的库尔德部落先后加入土耳其阵营，参与反对法国占领的军事活动。1926年，由于土耳其对库尔德和阿拉伯部落的鼓动和宣传，使得法军在贾兹拉地区遭遇了最大的军事阻力。^①整个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都在暗中支持一些

① Jordi Tejel Gorgas, "The Kurdish Cultural Movement in Mandatory Syria and Lebanon: An Unfinished Projec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1932-46," pp. 843-844.

反对法国的库尔德部落发起反法运动。1939年，土耳其支持的库尔德山莫罗德反法暴动同样遭到了法国军队的镇压。1940年，土耳其甚至多次支持莫罗德组织领导人易卜拉欣·哈利勒发动对法军的袭击。这些也进一步说明委任统治时期土耳其及其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话语对法国的库尔德人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库尔德人对法国委任统治的亲疏态度。“一战”后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阵营分化成挺法派与反法派。挺法派得到了法国当局的大力帮扶与结交，个别部落领导人甚至被授予叙利亚公民权。^①1931年，法国当局授予哈乔阿迦在哈塞克的永久居住权，同时允许其组建一支200人的部落武装。^②而那些坚定的反法库尔德部落和组织，则遭到了法国驻军的坚决打击。莫罗德反法暴动就是典型例证。此外，库尔德文化复兴运动的顺利推进，亦表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法国当局政府官员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旦涉及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问题，法国当局表现得相当慎重。从本质上来说，决定法国当局决策的依然是自身的殖民利益，库尔德人对法国的亲疏态度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

第四，法国当局内部亲库尔德派的政策导向。委任统治初期，法国当局尽管确立了分而治之的总体政策，但是并没有具体出台针对库尔德人的自治扶持政策。以皮埃尔·泰里耶为代表的亲库尔德派出现后，法国当局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法国当局默许泰里耶实施其支持库尔德人的小规模自治计划。在该计划的影响下，当局积极支持库尔德农业定居化工程、文化复兴运动以及甚至暗中鼓励库尔德人一基督徒联合自治运动等。当然，亲库尔德派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贾兹拉地区，并不涉及贾拉布鲁斯以及库尔德山等地区。泰里耶实施的贾兹拉自治计划也充分暴露了法国当局高级专员与驻地军官在库尔德人政策上的不协调性和矛盾性。

综上所述，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当局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政策的

① Dawn Chatty, *Displacement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30-232.

② Abbas Vali,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p.215.

演变，实质上是其“一战”中中东政策不成熟的表现，也是其对战后中东地缘政治剧变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所做出的直接反应和调适，最终旨在服务于法国在黎凡特地区的整体殖民利益。从长远来看，法国对库尔德人政策变化，对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乃至地缘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法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严重激化了法国当局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在加速了法国委任统治秩序崩溃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其次，在土叙边界争端中，法国对土耳其库尔德难民的接收及其对库尔德人反土耳其运动的支持，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严重不满，并激化了双边矛盾。作为报复，土耳其不断以泛伊斯兰主义分化库尔德部落，同样严重破坏了法国当局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委任统治秩序，影响了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最后，对库尔德人来说，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对库尔德人文化复兴活动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库尔德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叙利亚库尔德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但是法国的支持也引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库尔德人的进一步敌视，加剧了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内在矛盾的紧张。这些都为“二战”后叙利亚阿拉伯政府对库尔德人推行“阿拉伯化”和边缘化政策，并导致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从隐匿状态最终走向国际舞台埋下了因子。

（王艺儒，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博士生；

肖文超，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Abstract: During the wave of mass Germ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840s and 1850s, a group of revolutionary women who were forced into exile by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became profoundly involved in American social and public enterpri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n ethnic minority at that time, German women inevitably had to face the oppression of nativism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were barely noticed by 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which was dominated by white Anglo-Saxon women. At the same time, their efforts to find a role in society outside of the domestic sphere had not avoided the gaze of German males within the ethnic community. Ethnic and gender constraints, however, did not prevent these female "Forty-Eighters" from perpetuating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in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ith their experience in public speaking, newspaper editing, and verbal agitation gain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in Germany, as well as the network of political refugees and the influence on German-American communities of "Forty-Eigh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women quickly continued the role they had played as social reformers in Germany, actively mobilizing German women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lemma of dual identities in American society.

8. On the Change of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Syrian Kurds in Mandate

Wang Yiru , Xiao Wenchao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 France established a mandate in Syri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andat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Syria and contain the needs of Turkey, The French authoritie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Syrian Kurdish nationalism, received Kurdish refugees from Turkey, and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project in the Kurdish region, but did not support the Local autonomy demands of the Kurds. After in 1930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rab nat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the French authorities crack down on Arab nationalist implicit backing of the Murud anti-French upris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French authorities encouraged Syria's Kurdish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implemented the "Terrier plan" , even to supported Jazira autonomy movement conducted by the kurds and Christian. The change of French policy towards Syrian Kur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pheaval of post-war Middle East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upsurge of Arab nationalism, the propaganda of Turkish pan-Islam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Kurdish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change of French policy towards Kurds not onl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Syria,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9. Th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Garrison Army”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Yujie

Abstract: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Garrison Army” by the Japanese Army 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intelligence layout in China. By establishing close contacts with officials such as Yuan Shikai, and collaborating before and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troop was able to occupy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hidden front of espionage against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inent role of the troop in the cause of the Beiyang Army also created a better space for the troop to explore the Beiyang Army. As China and Japan gradually became hostile after the Japan-Russia Wa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roop and Yu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ddition, Yuan’s intention to approach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projected in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which in part resulted in different responses between Britain and Japan. The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troop and the King of Karaqin, as well as the complex network established by them, also shap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Manchu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o some extent.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the garrison army between 1903 and 1906 were often matched by many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10. Philosophy’s limit: Jeremy Bentham in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egal Reform Politics

Li Cheng

Abstract: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hilosopher Jeremy Bentham devoted to turning the Enlightened legal philosophy into reality but archived limited success. From 1788, with the help of Whig elites, Bentham built an extensive social network attempting to promote schemes such as the Panopticon prison and legal codification. During the course, Bentham developed different opinions with the Whig lawyer Samuel Romilly, and began to embrace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the 1820s, Bentham’s radical reputation in legal reform politics was rising, and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Irish Catholic leader Daniel O’Connell. Bentham and O’Connell once collaborated to promote radical legal reform.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arty politics, parties of legal reformers alienated with each other. This situation intensified Bentham’s political anxiety and pushed him to invent more popular